

“清华四子”在清华园

孔令环

“清华四子”——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孙大雨(子潜)因四人字号中都带有一个“子”字而得名,是新月诗派早期的中坚力量。提及“清华四子”的由来,学界一般认为源于闻一多^①,但他提到的“四子”实为“新月四子”,出身清华者只有“三子”:朱湘、饶孟侃、杨世恩,而无孙大雨。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最早提出清华“四子”的是罗念生,他在《给子沅》(作于1934年1月22日)中说:“当日子沅,子惠,子潜,子离在清华号称四子。”^②首次将孙大雨列入其中。“清华四子”之说也得到了孙大雨先生的认可^③,可见当年确有此事。“清华四子”的密切交往与文学活动都始于清华,因此,他们在清华园时期的史料是研究新月诗派所必须掌握的。虽然前人已经做了一些考证,但仍存在缺失和讹误。因此,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清华四子的相关文献进行爬梳整理,尽可能地呈现“清华四子”在清华学校期间的状况。

一、清华四子的学籍及相关信息

清华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09年成立游美肄业馆,1911年初春更名为清华学堂,1912年10月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8月正式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④。清华学

堂成立之初,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两科,学制各四年,数月后改为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1913年8月起,重新恢复中等科、高等科各四年的学制。1920年秋,中等科一年级停招。1921年,改高等科四年级为大学一年级,大一级学生仍为留美预备生。1925年设立大学部,招收大学一年级学生,向完全大学过渡,大学部学生不再是留美预备生,被称为新制生,而原来的留美预备部的学生则称为旧制生^⑤。由于“清华四子”中入学最早的是在1916年秋,最晚的在1922年秋,因此四人都属于旧制生。从他们所在的年级看,饶孟侃、朱湘为同一年级,按学制应于1924年毕业;杨世恩、孙大雨比饶、朱二人低一级,按学制应于1925年毕业。当时清华学校通常以预计毕业时间的干支纪年来命名年级,1924年与1925年分别为甲子年和乙丑年,因此饶孟侃、朱湘为甲子级,杨世恩、孙大雨为乙丑级。下面按照四人年级的高低及入学早晚顺序对他们的学籍及相关信息逐一考证。

饶孟侃是清华四子中最早进入清华学校的。关于饶孟侃的学籍情况,学界最通行的说法是1916年入学,1924年7月毕业^⑥。其中入学时间是正确的,但没有给出更具体的时间,而1924年毕业则是错误的。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饶孟侃在清华



的学籍情况大致如下：

当时清华学生入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作为普通生正常进入中等科一年级，一种是作为插班生插入更高的年级。1917年6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三次临时增刊》（以下将《清华周刊·临时增刊》简称为《临时增刊》）中的《清华学校同学录》中，饶孟侃在中一级名单内^⑦，由于《临时增刊》每年均在暑期前出版一次，因此显示的是上年秋至当年夏之间学生所在的级别，可见，饶孟侃考入清华后进入的是中等科一年级，属于普通生。据《清华周刊》第159期“校闻”栏中三级甲、乙、丙、丁四个班的班长名单，饶孟侃为中三级乙班中文班长^⑧，可知当时每个年级分为四个班，饶孟侃所在班级为乙班。关于饶孟侃入学的具体时间，据1916年9月27日《清华周刊》第80期上的《开学志礼》：“月之十一日为本学期行始业式之日。”^⑨可知饶孟侃的入学时间为1916年9月，入学典礼日为9月11日。

关于饶孟侃的离校，学界最通行的说法是《饶孟侃诗文集》所附《年谱》中所说的：1924年7月“清华毕业。因膳食不洁与斋务一外籍职员发生争执，职员竟以阻止留学为要挟，一怒之下，自动放弃留美名额，滞留北平”^⑩。黄延复曾在《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饶孟侃是肄业：“1936年出版的清华正式毕业生名录中，没有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被列在肄业生名录中，原因待考。”^⑪根据笔者查到的资料，黄延复的说法是正确的，笔者了解到了饶孟侃肄业的原因是饶孟侃在最后一学年中被留级，他并未选择再上一年完成学业，因而没有毕业。1923年6月出版的《第九次临时增刊》与1924年6月出版的《第十次临时增刊》上的两份《同学录》显示，饶孟侃所在的年级都是高三

级^⑫，这就说明饶孟侃在1923年秋没有按常规升入大一，而是降了一级（从甲子级降到乙丑级）。这一证据并非孤证。《清华年报》（*Tsinghuapper*）（1923—1924）同学录中，饶孟侃也是被放在高三级（乙丑级）名单内^⑬。两种刊物同时出错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根据当时《清华年报》体例，毕业班每人附上照片和简介，非毕业班则只有集体合影和名单，差距甚大，很难混淆，因此，饶孟侃显然是被降了一级（当时清华处罚学生的条例中有降级处分）。但是，饶孟侃究竟是刚上大一就被降级还是临近毕业才被降级尚不确定。如果留级后饶孟侃继续上学的话，应于1925年夏随乙丑级毕业，然而在《清华年报》（1924—1925）同学录中，毕业生名单内仍无饶孟侃。其清华校友毕树棠在《二十年来清华文坛屑谈》中也说：“饶孟侃有敏才，性最活泼，修业未滿，即去清华。”^⑭因此，饶孟侃应该是没有接受降级处分而选择了肄业，其原因尚待进一步考证。

朱湘虽然与饶孟侃同级，但比饶孟侃入校时间晚，属于插班生。关于朱湘的入学时间，学界并无定论。其中1921年之说难以成立，钱光培先生已经对此进行过辨误^⑮。此外主要还有1919年、1918年两种说法。朱湘的校友罗念生、孙大雨都认为1919年入学，罗念生还进一步声称朱湘是插入中等科四年级。不过罗念生的结论是根据朱湘在《海外寄霓君》中自称的“清华住的那六年”推算出来的^⑯，孙大雨只是陈述，并未列出证据。这种说法由于二人与朱湘的密切关系而在学术界认可度最高。而丁瑞根的《悲情诗人——朱湘》说朱湘1918年9月入清华学校，插入中等科三年级^⑰，但他唯一列举出的证据也只有朱湘所说的“清华六年”。“六年”这一时段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罗念生、孙

大雨为朱湘同校好友,在证据相同的情况下自然更具有信服度,因此丁瑞根的说法并未得到认同。

据笔者查阅的资料看,朱湘入清华学校的时间正如丁瑞根所说,证据如下:出版于1919年6月的《第五次临时增刊》中的《本校同学录》显示,中三级名单中有“朱湘”之名,籍贯为“江苏江宁”,暑期通信地址为“杭州里横河桥十四号”^⑩。如前所述,《临时增刊》的出版时间均在暑假之前,所以显示的级别是1918年秋至1919年夏这一学年的级别,因此,朱湘是1918年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而且暑期地址与朱湘在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时的地址相同,是其叔父一家客居杭州的地址^⑪,也就排除了这个朱湘是与其重名的另一个人的可能性,因此朱湘入学时间为1918年秋而非1919年。清华学校秋季开学一般在9月份,《清华周刊》第144期“校闻”中关于这一学期最早的消息是9月13日科学社开会的消息,各学生团体的迎新会也大多在9月中旬以后^⑫,可见1918年秋季开学时间在9月。此外,1918年10月24日《清华周刊》第146期上发表有朱湘的三首旧体诗(《蝉鸣》《前题》《雪后松》)^⑬,显然朱湘此时已在清华,因此,朱湘入学时间应为1918年9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朱湘在哪个班并未查到,因此不能确定是否与饶孟侃同班。

关于朱湘辍学时间,到目前为止,主要有1923年冬、1923年冬或1924年春、1924年即将毕业时等几种说法^⑭;其辍学的原因学界认知也有分歧,因为当时的“旷课”不仅包括“缺课”(未请假不上课),也包括违反早餐点名制度。同样作为朱湘的好友,孙大雨认为是违反早餐点名制度^⑮,罗昺岚认为是缺课^⑯,罗念生认为二者兼有^⑰。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朱湘被开除的

原因主要是缺课次数过多,其缺课行为发生在1923—1924学年的上学期(即1923年秋至1924年初),但并未被当即开除或开除处罚未被严格执行,而是在1924年初新学期伊始被从严办理,其离校时间是在1924年3月上旬。理由如下:

1924年3月1日《清华周刊》第303期“要闻”栏中第一次公布了朱湘辍学的消息:“董凤鸣君因故休学二年半,朱湘君因故辍学。”^⑱这一期是1924年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一期,而在上一学期最后一期(即第302期)的文学社新闻中还有饶孟侃撰写的朱湘在小说组讨论会上报告《花月痕》的新闻,可见朱湘在上学期并未被开除或开除处罚未被严格执行。1924年4月11日《清华周刊》第309期上的《学生缺课新章草案》中特意将朱湘作为严重违反校规的典型写入文件:“就学生个人而论,则自每日按时上课,以至随意缺课如朱湘者,无所不有。上学期开学后,约十星期内,朱湘曾缺课至一百二十一小时。然其中仅十二小时,系未经准假者。”^⑲可见,朱湘的缺课行为发生在上学期,且更清楚地说明了朱湘缺课的具体情形。文件中还提到因学生缺课引起教员不满的情况,因而可以断定这里所说的“缺课”指的就是无故不上课而不是违反早餐点名制度。1924年3月14日《清华周刊》第305期上有《离校南下》的消息:“大一级同学朱湘君因不满意课程压迫,拟于上学期终离校。后得当局特请,在校中当图书馆名誉馆员逗留月余。今寒假已满,朱君已于上星期起程南下,就南京建业大学教授职云。”^⑳也可以与文件互相印证。这则消息中还提供了朱湘离校的具体时间,文中的“上星期”指的是1924年3月3日至3月9日之间,因此朱湘的离校时间正是在这一周之内。

朱湘1926年9月复学、1927年6月毕业以及同年8月出国留学的情况,现有研究颇详,兹不赘述。因此,朱湘在清华学校的时间为1918年9月至1924年3月初和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

杨世恩是清华四子中继饶孟侃之后最早进入清华的,1918年6月出版的《第四次临时增刊》的《本校同学录》中,他名列中等科一年级名单中,可见他是1917年考入清华,属于普通生。至于入学具体日期,据1917年9月20日《清华周刊》第112期《开学志略》:“本校于月之十日开学”^⑳,可知为9月10日。《清华周刊》第146期“校闻”中显示,杨世恩为中二级乙班英文班长兼国文班长^㉑,因此他所在班级是乙班。

杨世恩毕业后入清华研究院深造一年虽已为学界所知,但具体情形依然是一个谜团。笔者发现了不少关键的证据,恰可解开这一谜团。

清华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据当年的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清华学校旧制‘大一’级毕业生,得学校推荐及专任教授许可者,得为本院特别学员。”^㉒杨世恩毕业于1925年,正好有资格入研究院。《清华周刊》第349期中有一则《毕业入研究院》的消息,云:“大一级同学罗伦、王国忠、杨世恩三君,闻已决定毕业后留国一年,入本校研究院攻求经史之学,以期深造。”^㉓而且,《清华周刊》第350期上研究院《学生一览》中有杨世恩之名^㉔,《清华年报》(1925—1926)上关于研究院国文系的介绍中,杨世恩为“未交照片之学员”^㉕。这些证据充分证明,杨世恩1925年秋至1926年夏是在研究院攻读。由研究院《学科范围》中所说“该院定于九月十四日,正式始业”^㉖可知,研究院的开学日期为1925年9月14日。杨世恩在研究院

研究的课题也有幸被找到。《清华周刊》第355期上研究院《研究题目汇录》中,杨世恩的研究题目为《诗经国风诸篇之体裁》^㉗。

遗憾的是,杨世恩原本该与孙大雨一同出国留学,但是却在去上海途中不幸染病去世。据《清华周刊》第430期(误印为第429期——笔者按)上的《子惠纪念基金征求启》和《杨子惠传略》,杨世恩1926年春末回上海做出国的准备,在杭垣游程中,饮食失慎患肠热症(即伤寒),回到上海,为医家所误,1926年7月18日下午四时于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小楼上逝世^㉘。

关于孙大雨的入校情况,孙大雨自称是“1922年考入高等科”^㉙,但并未提及插入的年级,1923年6月出版的《第九次增刊》上的《教职员及在校同学通信住址一览》中显示,孙大雨以“孙铭传”之名被列入高二级名单内^㉚,可见插入的年级是高二级。《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校历》显示:1922年7月3日,高等科插班生入学考试;9月8日至9日,新旧学生报到缴费;9月11日开学典礼^㉛。可知孙大雨入学的具体流程与时间。孙大雨的毕业时间,据《清华周刊》第348期“校闻”,大一级毕业典礼日为1925年6月17日^㉜。此外,孙大雨说:“只要修完高等科毕业,就取得官费去美国留学的资格。”^㉝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当时高等科四年级已经改为大一级,因此,他在清华的三年依次上的是高二级、高三级、大一级。

关于孙大雨出国的具体日期与行程,笔者从《申报》中找到了关键证据。据1926年8月21日《申报》第11版上题为《明晨乘麦金兰号放洋之赴美生》的消息,其中赴美清华学生名单中有孙铭传(孙大雨)。行程安排为:“于二十二日晨八时由沪启旋,二十四日到神户,二十五日开,二

十六日到横滨,二十七日开,九月七日到美国西雅图。”1926年8月22日《申报》第11版上有《大批学生今晨乘麦金兰号赴美》的消息,赴美学生于昨日下午四时起陆续登上麦金兰号邮轮,邮轮于当日八时启航。此外,1926年9月10日《申报》第11版上有《清华赴美学生等已抵美》的消息,称赴美学生已于本月7日抵达西雅图。以上文献资料足以证明孙大雨于1926年8月22日出国,9月7日到达美国西雅图。

当年《清华年报》特意给毕业生每人附上本人照片和一段简介。除饶孟侃外,朱湘、孙大雨、杨世恩三人都享受了这种待遇。朱湘简介的中译文已见于陈越的《朱湘清华时期行状及集外佚诗文钩沉》(《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在此不再赘述,兹将杨世恩与孙大雨的简介译文发布如下:

杨世恩
浙江鄞县

英文部分译文为:

杨不想让他的生平像莎士比亚的生平一样,成为一个谜,因此他允许在《清华年报》中插入以下几行文字,作为后来学者的史料,因此他写道:

1904年4月12日出生,1925年夏天穿着西服出国;30岁结婚,1965年去世。

“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他虽然喜欢以五柳先生自命,可是先生不求甚解,他一进图书馆便要啮文嚼字;先生鹑衣百结,环堵萧然,他还不时接到挂号信^④。(按:此段原为中文)

可惜造化弄人,杨世恩英年早逝,他的这段人生规划都成了梦幻泡影。倒是在无意间留存了关于杨世恩的出生日期和他在



《清华年报》上杨世恩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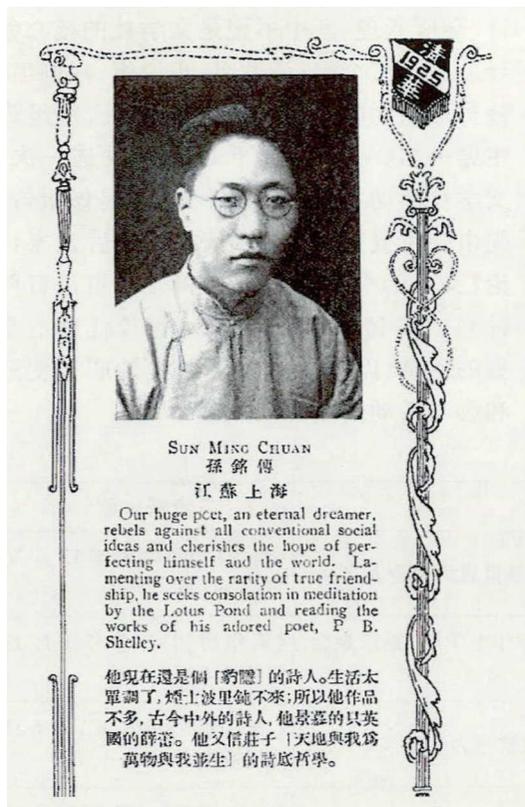
清华读书时的些许宝贵资料。

孙铭传
江苏上海

英文部分译文为:

我们的大诗人,一个永恒的梦想家,反叛一切传统的社会观念而珍视完善自我和世界的希望。他感叹真正友谊的珍稀,在荷花池畔的沉思和阅读他敬爱的诗人 P. B. 雪莱的作品中寻求慰藉。

他现在还是个“豹隐”的诗人。生活太单调了,烟士波里钝不来;所以他作品不多,古今中外的诗人,他景慕的只英国的薛蕾。他又信庄子“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诗底哲学^④。(按:此段原为中文)



《清华年报》上孙大雨(孙铭传)信息

二、清华四子与清华文学社

清华四子都是清华文学社成员,但是,他们入社时间、职务变迁及参与文学社活动的情况却仍然只存在于零星的叙述中,且多有舛误,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杨世恩与饶孟侃的入社时间是最容易确定的。杨世恩是在清华文学社成立时就加入的,据《清华周刊》第227期“校闻”,清华文学社于1921年11月20日晚七时举行成立大会,公布的14位社员名单中就有杨世恩⁴⁵。饶孟侃的入社时间见于《第八次临时增刊》,1922年5月21日文学社开“送旧迎新会”,送闻一多等人出国留学,欢迎饶孟侃、万卓恒、郭协邦、马杰、程瀛元、高瀚、梁思永7人入社⁴⁶。

孙大雨和朱湘的入社时间则没有定

论。孙大雨的入社时间,目前研究中最具体的时间是陈子善先生在《硕果仅存的“新月”诗人孙大雨》中提出的1922年10月前,其证据就是闻一多1922年10月27日致梁实秋信中提到的“我们加入了两位新会友——郑君骏全和孙君铭传”⁴⁷。笔者认为还可以更进一步推算出具体日期。1921年11月20日清华文学社成立时共入社14人,1921年12月2日开第二次常会,新加入二人:吴文藻、盛斯民,加入后共有16人⁴⁸,1922年5月21日,饶孟侃等7人入社,加入后共23人,以上社员名单中均无孙大雨。据1922年9月23日《清华周刊》第251期“校闻”,文学社“上周五”开会,新增社员两名,增加后共25人⁴⁹。这里所说的“上周五”即9月15日。闻一多在1922年10月27日的信中还提到他在周刊和私人通信里得悉文学社创办杂志的消息和出版丛书的计划,经核查,这些信息均见于《清华周刊》第251期。另外,他信中提到行素的《回清华之前一夕》也见于该期⁵⁰。可见闻一多所说的“周刊”指的正是《清华周刊》第251期。从这一时期闻一多与清华同学的通信来看,闻一多收到清华同学来信通常需要一个月左右,也就是说,闻一多收到的信的发出时间大约在9月下旬,再加上9月23日至10月27日之间《清华周刊》上关于文学社的新闻中除了第251期外未见有增加社员的消息,闻一多信中提到的两位新会友郑骏全和孙铭传(孙大雨)应该就是《清华周刊》第251期上提到的两位新增社员,所以,孙大雨加入清华文学社的时间应是1922年9月15日。

朱湘入社的大致时间也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从以上对孙大雨入社时间的推论可知,既然直到《清华周刊》第251期出版为止朱湘并未出现在文学社社员的名单内,

那么朱湘的入社时间必定晚于这一日期(即1922年9月23日)。据《清华周刊》第266期“校闻”,文学社于1922年12月29日曾聚会选举职员,朱湘被选为书记^⑤,可见此时已经入社,因此朱湘入社时间应在1922年9月23日至1922年12月29日之间,具体日期还需进一步考证。

清华四子在文学社中的职务和参与活动的情况,学界之前关注不多。据现有资料显示,文学社常设职务有书记、干事、会

计、会所管理,其中书记是文学社的核心领导。下设三个组:诗歌组、小说组、戏剧组,社员可以同时为不同小组的成员,每组设主席一名,一般情况下每学期改选一次。文学社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做报告,先由一位或数位社员做报告,然后大家讨论(又分为全体成员参加和分小组进行两种);二是请名人做演讲。笔者就目前掌握的信息,以时间为序将四人的职务变迁和参与活动的情况列表如下:

清华四子职务变迁及参与活动	资料来源
1921年12月23日晚开常会讨论“文学可以职业化么?”杨世恩为报告人之一	《清华周刊》1921年12月30日第232期
文学社于1922年1月6日举行本学期(即1922—1923学年上学期)最后聚会,杨世恩被选为下学期会所管理	《清华周刊》1922年1月13日第234期
1922年12月29日文学社开会,朱湘被选为书记,饶孟侃被选为干事	《清华周刊》1923年1月6日第266期
饶孟侃于1923年3月9日晚召集文学社丛书编辑经理会议	《清华周刊》1923年3月16日第273期
文学社拟于1923年4月29日(清华学校建校十二周年纪念)出版《文艺汇刊》,杨世恩担任校内发行经理,饶孟侃担任京内发行经理,朱湘担任书记	《清华周刊》1923年4月6日第276期
文学社上周开会,选举本学期职员,饶孟侃为干事,朱湘为书记兼诗歌组主席,杨世恩为会所管理。留学生组织起文学社支会,支会干事为闻一多	《清华周刊》1923年10月5日第288期
小说组每半月开会一次,已报告的有朱湘的《花月痕》及杨世恩的《塌堤孩》(徐志摩译)	《清华周刊》1924年1月11日第302期
文学社职员:文牍 Secretary(即“书记”):朱湘;干事 Manager:饶孟侃;会所管理 Club-room Manager:杨世恩;会计 Treasurer:孙铭传(孙大雨) ^⑥	《清华年报》(1923—1924)
文学社选出本学期职员:干事饶孟侃,书记兼会所管理杨世恩,会计孙铭传(孙大雨)	《清华周刊》1924年3月1日第303期
文学社上学期大考后曾开一俱乐会,选举职员,杨世恩为干事兼会计,孙铭传(孙大雨)为书记兼会所管理	《清华周刊》1925年2月13日第335期
孙铭传(孙大雨)来函,内容为:“文学社本学期书记为翟楚君。鄙人乃一光杆社员并非职员。特此声明更正。”	《清华周刊》1925年2月20日第336期

参考上表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可以大致勾勒出清华四子在清华文学社中的活动轨迹。自文学社成立至1922年底,只有杨世恩在文学社中担任职务。从1923年起,随着朱湘的加入并担任书记,饶孟侃与孙大雨也相继在文学社担任重要职务,1923年遂成为清华四子在文学社活动中最活跃的一年。朱湘刚上任即赶上文学社筹划出版《文艺汇刊》,饶孟侃、杨世恩也参与其中,饶孟侃还为此专门召集过编辑经理会议。朱湘、饶孟侃二人都在《文艺汇刊》上发表有诗文,孙大雨虽然没有担任职务,但也在《文艺汇刊》上发表有诗歌,清华四子在文学上的合作交流由此开始。《清华年报》(1923—1924)显示,清华四子曾一度全揽了文学社社务,成为文学社的中坚力量。从1923年夏天朱湘寄给孙大雨的若干信件中可知,这一年暑假中,朱湘还通过文学社轮回信的方式与社友进行交流,讨论文学社的事务(比如8月21日朱湘致孙大雨的信中提到他在文学社轮回信中提议办不定期刊物或季刊^⑤)。1923年秋,留学海外的文学社社员组织起文学社支会,可见闻一多等人并未因出国就中断与文学社的联系;诗歌组仍长期定期邀请学者演讲,文学社的活动也并未因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相继出国而走向停滞,只是因为没有办法集中发表作品的刊物而显得成果寥落。由海外组织文学社支会的新闻为朱湘所编发可知,朱湘至少在1923年就开始和闻一多取得了联系,为后来清华四子与闻一多共同探讨诗艺埋下了伏笔。清华四子也正是在1923年共同管理文学社会务及参与文学社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就是说,清华四子过往甚密的现象并非始于1925年他们合租同住在北京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屋子之时,而是早在1923年已经开始了。

1924年初朱湘离校后,会务由杨世恩、饶孟侃、孙大雨三人接管。饶孟侃肄业后,杨世恩、孙大雨曾先后担任文学社书记。在孙大雨担任文学社书记期间,他利用在《清华周刊》担任文艺栏主任的便利,促成《文艺增刊》的续刊,给文学社社员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阵地。在此期间,孙大雨也与梁实秋、闻一多建立起联系,为后来闻一多回国后与清华四子重聚发起新诗形式运动奠定了基础。1925年,孙大雨在《清华周刊》第336期上发表来函,表示不担任文学社书记。从孙大雨来函的语气推测,孙大雨与清华文学社其他社员之间发生了矛盾。孙大雨毕业后,杨世恩成了清华四子中唯一的在校生,而且他也无心会务了,于是在《清华年报》(1925—1926)中,杨世恩(署名“恩”)发表声明:“年来本会因会友离校较多,在校人数日少,已致精神逐渐不振,会务与时俱衰。及至今年,几人完全停顿状态,而杨君世恩实负其咎。盖本会新职员虽早已依法产出,而杨君一再延误,不克遽办交代,以致目前无可陈述。幸会友皆有复兴本会之意,将于本学期开一新纪元云。”^⑥至此,清华四子从文学社中相继全部退出(直到朱湘后来复学后才又与文学社重新建立起联系),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们的走散,相反,他们在与文学社其他社员拉开距离的同时才真正凸显出他们对新诗具有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的兴趣,他们1925年得以与闻一多、刘梦苇等志同道合的新朋友逐渐汇聚,而那一次新的汇聚对于新月诗派形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月诗派源自清华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由以上论述看来,清华四子是促成新月诗派形成的重要因素。

朱湘复学后,虽然只在清华待了一年,但在文学社中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罗念生、罗昉岚、柳无忌等人走上文学道路,

与朱湘的提携鼓励有密切关系。而且他还组织编印了清华文学社的第二辑会刊——《文艺汇刊》(由于编辑疏忽,被印为“文艺会刊”),促进了清华文艺的发展。

三、清华四子的编辑活动

当时的清华学校有不少刊物,大多是

由学生主办的,其中《清华周刊》是规模最大的学生刊物,除主刊外,还在不同时间段出版有《清华年报》《文艺增刊》《书报介绍副刊》《临时增刊》《清华文艺》等副刊。清华四子在校期间都参与过编辑活动,尤其是与《清华周刊》的关系比较密切,为更直观地呈现清华四子的编辑活动情况,现列表如下:

姓名	职务变更	资料来源
杨世恩	任《清华周刊》中一级访员	《清华周刊》1917年10月4日第114期
	任《清华周刊》中文访员	《清华周刊》1918年3月14日第132期
	任《通俗周报》第二期集稿员	《清华周刊》1920年12月31日第205期
	任《通俗周报》责任投稿员	《清华周刊》1921年4月22日第217期
	任《清华周刊》集稿员	《清华周刊》1921年9月15日第223期
	任《清华周刊》社学生代表	《清华年报》(1921)
	任《清华周刊》复刊后第三期集稿员	《清华周刊》1921年11月11日第225期
	任《清华周刊》文艺栏集稿员	《清华周刊》1922年9月23日第251期
	任本期文艺栏集稿负责人	《清华周刊》1922年10月7日第253期
	任《清华年报》中文编辑	《清华周刊》1924年5月30日第316期
朱湘	任《通俗周报》集稿员	《清华周刊》1921年9月15日第223期
	任下学期《清华周刊》编辑兼经理	《清华周刊》1923年5月18日第282期
	任《清华周刊》书报介绍栏主任兼特载栏成员	《清华周刊》1923年9月21日第286期
	辞去《清华周刊》编辑职务	《清华周刊》1923年9月28日第287期
孙大雨	任《清华年报》中文编辑	《清华周刊》1924年5月30日第316期
	任《清华周刊》文艺栏主任	《清华周刊》1924年9月19日第319期
	任《清华周刊》文艺栏主任	《清华周刊》1925年1月9日第334期
	辞去《清华周刊》编辑	《清华周刊》1925年3月20日第340期
饶孟侃	任《清华周刊》新闻栏编辑	《清华周刊》1923年9月21日第286期
	任《清华周刊》新闻栏主任	《清华周刊》1923年11月30日第296期
	任《清华周刊》新闻栏主任	《清华周刊》1924年3月1日第303期
	辞去《清华周刊》新闻栏主任	《清华周刊》1924年3月21日第306期

此外,朱湘还参与过清华文学社《文艺汇刊》《文艺会刊》和《消夏旬刊》的编辑。这些编辑活动使他们熟悉编辑部的运作流程,为他们将来办刊物积累了经验。在杨世恩、孙大雨担任编辑期间,对文学社社员作品都起到过传播推介的作用,孙大雨的贡献尤大。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已经被迫停办多时的《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得以重刊,对促进清华文学社以及清华文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原来的《文艺增刊》于1922年11月创刊,虽然名为《清华周刊》的副刊,但由于是文学社主办,梁实秋、余上沅等人曾任主编,所以刊登的大多是文学社的作品,由此引起无法参与其中的同学们的不满,被讥为“包办”,后来编辑部因为发行《文艺增刊》致使办刊经费不足而提议提高《清华周刊》定价时,引起很多学生的不满,再加上编辑部内部和文学社内部都分歧严重,导致1923年4月《文艺增刊》在出版5期后停刊。孙大雨担任文艺栏主任后,即开始筹备重新出版《文艺增刊》,在《清华周刊》第319期上发表《〈文艺增刊〉续刊旨趣》(署名“传”),说明《文艺增刊》续刊的缘由并向同学们宣传文艺的重要性。1924年10月17日,《文艺增刊》第6期附于《清华周刊》第322期出版。至孙大雨提出辞职时,《文艺增刊》出版至第8期,然而从第9期的内容来看,有不少闻一多、梁实秋、孙大雨的作品,似已经被孙大雨编辑完成。孙大雨在编辑《文艺增刊》期间,刊发了闻一多、梁实秋及他本人的不少重要诗文,对促进文学社创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后来因为人事纷扰,孙大雨辞职,但已经成功地为清华文艺保留了一方赖以生存的空间,后来,《文艺增刊》更名为《清华文艺》,断续出版至1927年,后又有《文学会月刊》《文学月刊》等文艺刊

物,正是借助于这些文艺刊物,清华文艺得以存续发展。罗念生、罗昞岚、曹葆华、孙毓棠等一批诗人、作家都是从这些刊物出发走向文坛的。

结语

打开历史的尘封,回顾清华四子的清华往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探寻到他们文学的起点以及他们从清华文学社出发走向新月诗派的曲折历程,并由此确认清华四子在清华文学社及新月诗派形成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在现有的研究中,除朱湘外,对清华四子其他三子尤其是孙大雨在清华文学社及新月诗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显然是低估了。目前学界对这段史料的整理考辨还存在诸多不足,语焉不详、莫衷一是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一直存在,制约甚而误导了对新月诗派源头的研究。本论文对清华四子清华园时期活动的考证,正是出于对这段历史补阙正误的考虑。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为新月诗派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 依据是闻一多1926年4月15日致梁实秋、熊佛西的信,信中写道:“《诗刊》重要分子当数朱、饶、杨、刘(梦苇)。四子中三人属清华,亦又怪事也。”孙党伯、袁睿正主编,闻一多著:《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②⑬⑭⑮ 罗昞岚、柳无忌、罗念生:《二罗一柳忆朱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6、130、4、73页。

③ 孙大雨在《我与诗人朱湘》中说:“我也曾编辑过《清华周刊》的文艺副刊,并与同窗几位好友成为新诗坛的所谓‘清华四子’(子沅一朱湘、

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子潜—孙大雨)。”孙近仁编,孙大雨著:《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④ 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⑤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页。

⑥⑩④⑥ 王锦厚、陈丽莉编,饶孟侃著:《饶孟侃诗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5页,第415页,第412页。

⑦ 《清华周刊·第三次临时增刊》,1917年6月版,《清华学校同学录》第43页。

⑧ 《清华周刊》,1919年2月20日第159期,第7页。

⑨ 《清华周刊》,1916年9月27日第80期,第14页。

⑪ 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页。

⑫ 参看《清华周刊·第九次临时增刊》,1923年6月版,第105页;《清华周刊·第十次临时增刊》,1924年6月版,《在校同学暑假通信处一览》第7页。

⑬ 《清华年报》(1923—1924),第65页。

⑭ 《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1931年5月版,《二十年来清华文坛屑谈》第3页。

⑮ 钱光培:《现代诗人朱湘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⑯⑰ 丁瑞根:《悲情诗人——朱湘》,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第20页。

⑱ 《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1919年6月版,《本校同学录》第47页。

⑳ 《清华周刊》,1918年10月3日第144期,第2—3页。

㉑ 《清华周刊》,1918年10月24日第146期,第15—16页。

㉒ 如丁瑞根认为朱湘被开除的时间是在1923年底(丁瑞根:《悲情诗人——朱湘》,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钱光培认为是在1923年冬或1924年春(钱光培:《现代诗人朱湘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孙大雨认为是在1924年(孙近仁编,孙大雨著:

《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㉓⑳㉒ 孙近仁编,孙大雨著:《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第323页,第323页。

㉔ 《清华周刊》,1924年3月1日第303期,第42页。

㉕ 《清华周刊》,1924年4月11日第309期,第15页。

㉖ 《清华周刊》,1924年3月14日第305期,第35页。

㉗ 《清华周刊》,1917年9月20日第112期,第14页。

㉘ 《清华周刊》,1918年10月24日第146期,第9页。

㉙ 《清华周刊》,1925年11月20日第360期,第22页。

㉚ 《清华周刊》,1925年5月29日第349期,第35—36页。

㉛ 《清华周刊》,1925年9月11日第350期,第48页。

㉜⑤④ 《清华年报》(1925—1926),第91页,第96页。

㉝ 《清华周刊》,1925年9月18日第351期,第32页。

㉞ 《清华周刊》,1925年10月16日第355期,第23页。

㉟ 《清华周刊》,1928年2月24日第430期,第213—214页。

㊱ 《清华周刊·第九次临时增刊》,1923年6月版,第112页。

㊲ 《清华周刊》,1922年10月7日第253期,第17页。

㊳ 《清华周刊》,1925年5月22日第348期,第20页。

㊴④ 《清华年报》(1924—1925),第76页,第63页。

㊵ 14人分别为闻一多、时昭沅、陈华寅、谢文炳、李迪俊、翟桓、吴景超、梁治华(梁实秋)、顾毓琇、王绳祖、张忠绂、杨世恩、董凤鸣、史国刚(《清华周刊》1921年11月25日第227期,第20页)。

④7 陈子善:《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6页。

④8 《清华周刊》,1921年12月9日第229期,第24页。

④9 《清华周刊》,1922年9月23日第251期,第23页。

⑤0 孙党伯、袁睿正主编,闻一多著:《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⑤1 《清华周刊》,1923年1月6日第266期,

第24页。

⑤2 虽然《清华年报》(1923—1924)出版时间在1924年5月底或6月初,但是朱湘在1923—1924学年下学期刚开始即被开除,而在《清华年报》(1923—1924)上,朱湘仍然出现在大一级学生和文学社简介中,因此年报上与朱湘有关的消息应该是1923—1924学年上学期的,比下一条目中的内容发生的时间早,故放在其前面。

⑤3 陈子善编,朱湘著:《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史料消息

“郑超麟在中共中央机关史料征集与整理” 学术研讨会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召开

会议由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宣传通讯》、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四大纪念馆联合举办,于2021年12月26日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召开,来自线下线上的党史专家、学者8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郑超麟在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他参与编辑出版的《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等早期党刊党报的宣传工作进行了讨论。1924年9月,郑超麟与陈延年等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安排在中央宣传部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共产主义的ABC》就是他的重要翻译成果;大革命失败后又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担任主编。会上发放了影印的《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和《共产主义的ABC》,为党的历史研究和红色文献翻译研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